

都市运动：中国的城市变迁与城市转型

Metropolitan Movement: Urban Vicissitude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朱喜钢

【摘要】 城市变迁与城市转型是中国都市运动的特征性现象与核心内容，是社会经济全方位发展与变化过程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城市变迁表现出都市化超前发展、都市地位持续强化、都市区域正在成型并快速扩张等重要特征。由于都市化过程具有“运动式”的规模与速度，使得中国的城市变迁具有有别于其他国家不同的路径依赖与机制。文章认为人多地少是逼迫中国都市运动超前发展的物质诱因，全球化是背后推手，文化传统是内在“基因”，而管理体制是中国都市运动的持续性保障。因此，都市运动已经把城市化和都市化从单纯的地理或经济转变过程，上升为囊括一切的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市运动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城市转型。对都市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城市变迁与城市转型的特征规律。

【关键词】 都市运动 城市变迁 当代中国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urban vicissitude in China is the embodiment of all-rou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Chinese metropolitan movement perspectiv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e features of urban vicissitude: metropolitan is faster than urbanization, metropolitan status is continuing strengthen, metropolitan area is taking shape and rapid expansion. As metropolitan process has “campaign style” scale and

speed, making urban vicissitude in China's has a different path dependence and mechanisms from other countrie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densely is material incentive forcing movement ahead in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urban movement. Cultural traditions is internal “genes”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continued momentum of China's urban movement. Therefore, metropolitan movement has put the urbanization and metropolitan from a purely geographical or economic transition, rising to all-encompassing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vicissitude. In a sense, metropolitan movement is an essentially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its core is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metropolitan movements help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 of urban vicissitude、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words: Metropolitan Movement, Urban Vicissitude, urban transformatio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体现为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变迁过程。在变革、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所经历的变迁更显现出其深刻性和独特性，也更能体现和代表中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中国城市变迁的特征与表现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过渡，是城市化进程深入推进的结果，也是城市变迁的最终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演进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欧洲是“网络”型的城市化，美国具有鲜明的大都市区化特征，而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则体现为单极城市化。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与都市化比较

表 1

年份	城市人口 (万人)	变化 (万人)	都市人口 (万人)	变化 (万人)	城市化水平 (%)	变化 (%)	都市化水平 (%)	变化 (%)
1990	19329.81	—	7484.3	—	26.41	—	10.23	—
1998	25706.69	+6376.88	10118.64	+2634.34	30.4	+3.99	12.05	+1.82
2005	38185.65	+12478.96	13175.12	+3056.48	43	+12.6	14.84	+2.79
2007	39428.87	+1243.22	18037.38	+4862.26	44.94	+1.94	20.56	+5.72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1 “都市化”特征

“都市 (metropolis)”不同于“城市 (urban)”,是指那些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按照传统分类方法,人口规模大于100万为特大城市,50万~100万为大城市,小于50万为中小城市。都市化 (Metropolitanization)是都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上升和影响增大的过程。国际都市化的迅速加快不仅是现代世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趋势,而且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1]。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人口小于50万的中小城市经济规模相对较小、辐射影响范围有限,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经济实力较强,通常也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因此,笔者从本文研究的需要出发,将人口大于50万的城市定义为“都市”。据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变迁生动地体现为城市的变迁,而城市变迁又集中表现为都市的成长和扩张,突出地表现在都市化水平、都市地位、都市区域三个方面。

(1) 都市化快于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已经为统计数据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然而,在城市化基础之上,由都市发展引领的都市化水平的提高更能揭示中国城市化的现象特征。伴随1990年代以来的快速城市化,我国的都市化不断加快。特别是2005年以来,都市化速度明显快于城市化速度。1990~2005年,城市化水平提高16.6个百分点,都市化水平提高4.6个百分点;2005~2007年,城市化水平提高2个百分点,都市化水平则大幅提升近6个百分点。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市化水平的提高将更为显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区域社会经济必然结果,而都市化超前发展则是当代中国的独特现象(表1)。

(2) 都市地位持续强化

都市经济实力强、辐射范围广,是区域现代化的最直接的空间载体,也是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主要

力量。根据世界经验,多数发达国家也都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向大的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完全按部就班地遵循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的一般路径,而是表现为:都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持续提升。1990年,我国仅有59个都市,占城市总数的12.4%,而到了2007年,我国都市数量增加到201个,占城市总数的比重达到30.7%,而GDP和财政收入均已占到全国总规模的2/3左右(表2)。

中国都市数量的增加

表 2

年份	城市数量 (个)	都市数量 (个)	都市比重 (%)
1990	467	59	12.4
1998	668	85	12.7
2000	663	93	14.0
2005	660	131	19.8
2007	655	201	30.7

(数据来源:《新中国城市5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都市区域成型并快速扩张

“大都市区”是美国城市化的鲜明特征。如今,这一现象在我国正在变成现实。20年间,都市的建成区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2.8万km²,其中北京、上海建成区面积已经迅速逼近1000km²。都市空间的持续扩张使得都市在空间规模和范围上越来越超出传统的城市行政范畴,成为实质上的“都市区域”,其特征是由若干相邻都市共同组成,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相互之间联系非常紧密,景观高度城市化、产业趋向一体化,有专门的都市区管理机构或定期的都市区论坛。与“城市群”相比,“都市区域”往往以世界级或国家级的大都市作为核心,外围则是与其紧密联系、一体化发展的区域级和地区级城(都)市。可以说,都市区域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最高等级。对外,它是面向世界的核

心竞争单元；对内，它是支撑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引擎。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区域已基本成型，辽中南、武汉、成渝等城市群正在向都市区域发展（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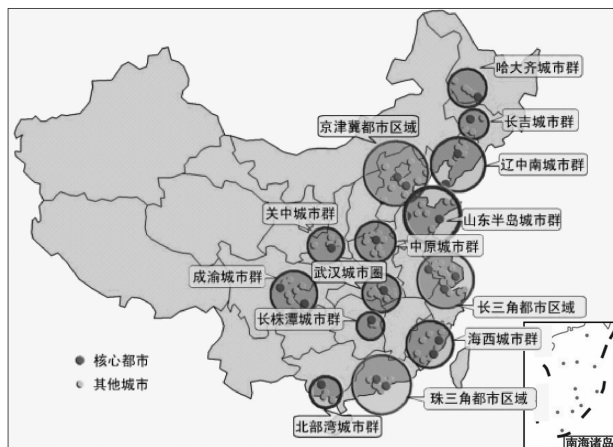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都市区域”和城市群分布图

1.2 “运动性”特征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运动”一词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动到复杂的人类思维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另一个方面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且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显然，我国都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具有浓厚的“运动性”特征。

199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8.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30%提高到45%左右用了10年的时间，而同样的过程，英国和法国用了40年，美国用了20年。同期，我国都市化水平虽然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但增加了整整一倍。我国都市化进程所表现出的“中国速度”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在此过程中，我国城镇人口从3亿增加到5.8亿。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仅仅用了9年时间就完成了近2亿人口的城市化，这相当于前两次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人口总规模（图2、图3）。按照都市化发展的一般趋势，我国城市化水平最终达到70%时（总人口按16亿计算），还将有超过5亿的人口需要城市化，而这一过程很可能在未来的三四十年的内完成，这几乎相当于世界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人口规模的一半。根据这种发展趋势，在未来的十年内，当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时，我国将有至少2.5~3亿的人口向城市转移，按照一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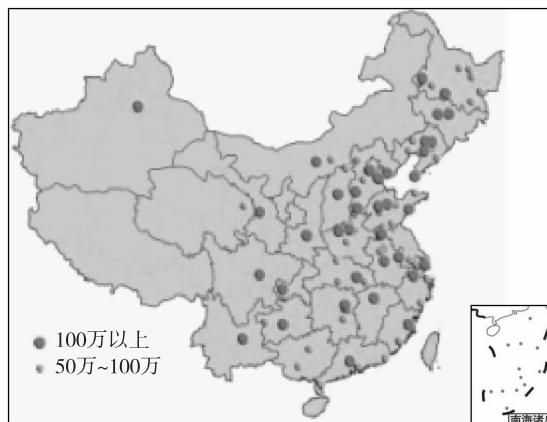


图2 1998年中国都市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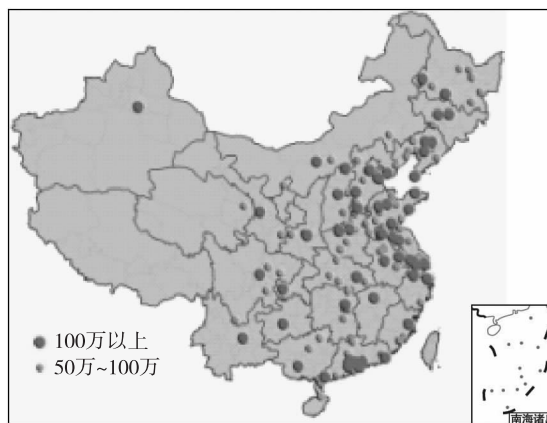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中国都市分布图

口进入都市计算，则还将产生100个以上的百万人口的都市，而目前全世界百万人口的都市总共才300座左右。这样的都市规模史无前例。

1.3 “超前性”特征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在都市化进程的冲击与裹挟下，由于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因而往往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都市化倾向^[2]。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都市超前发展成为引导中国城市化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社会性运动，用单纯的“都市化”已经难以表达这场潮流的特点和气势。因此，我们提出“都市运动”（the Great Process of Metropolitanization）^[3]，意在突出中国都市化的罕见速度、庞大规模和深刻影响。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人口的迁移大多经历了“农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都市”的过程，这不仅

生产、生活成本从低到高逐步推进的发展路径,也符合人们生活方式逐步转变的一般规律。从理论上讲,“先城市化再都市化”是世界范围的普遍规律。无论是都市化发达的国家,还是仍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市化都是后城市化的产物。从经验上讲,“先城市化再都市化”也是一再被证明的历史。

以美国为例,从殖民地时期到1920年,美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人口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1920年后,人口城市化比例上升速度趋缓,而人口向都市区特别是大都市区的集中趋势却日趋明显。如果以百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区人口比例作为美国都市化程度的衡量标准的话,从1920~1990年,这个比例迅速从不足20%提高到50%以上。可见,美国剧烈的都市化进程是在19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左右才大规模展开的。而我国的大规模都市化进程则在城市化水平30%时就已经展开,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超前性特征。而这一特征,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不足、都市化过度”具有形式上的某些相似性,但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中国的都市化与城市化早已“凝结成一条结实的绳子”,而都市化超前发展是中国国情的特殊发展路径,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美洲国家有明显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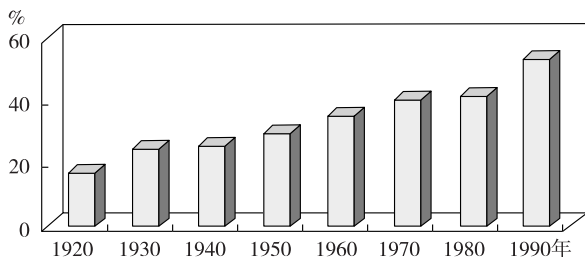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的都市化历程

2 都市运动的发展路径

2.1 人多地少是逼迫中国都市运动超前的物质诱因

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华夏民族在文明之初就必须依靠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寻求发展^[4],这也许就是当代中国都市运动的内在“基因”。一方面,我国拥有13.4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保证了都市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相对匮乏的土地资源事实上逼迫中国提前走上了都市运动的道路。尽管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但适于人类生活居住的平原仅占12%左右,人均耕地面积更排在了世界第120位以后。土地资源的稀缺要求我国走集约

型的城市化道路。根据城市规模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都市的土地使用效率更高。稀缺的土地资源客观上推动了土地使用效率更高的都市的迅速发展。

2.2 全球化是中国都市运动的背后推手

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尤其是经济和通信的全球化过程改变了我们生产、消费、管理、沟通和思想的方法^[5]。1980年代以来,这种改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强,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每个角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6]。最为明显的是对空间距离的淡化和模糊化。现代交通工具以及互联网使得跨越千山万水的困难变成举手之劳,新的时空观正在重塑着我们传统的空间认识逻辑并改变着我们传统的生产与生活观念。在“地球村”内,一种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关系,正在使得都市成为充分享受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实现全球化和参与城市竞争的最佳平台。

国际经济一体化、世界城市体系化的全球化背景使得都会型特大城市在国际与地区的城市竞争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首位度高的城市比首位度低的城市更能实现要素集聚与成本节约,在城市的规模、等级与城市的区域中心功能较高的情况下,都会型城市往往比普通城市更容易进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分工与合作网络,从而享受因此而带来的网络效益。在此情形下,就不难理解源自1990年代中期的以中国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目标为标志的中国都市运动的主观愿望的历史合理性。

国内激烈的城市竞争态势已经从招商引资的竞争演绎为城市品牌、城市文化等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文化竞争力已经成为决定城市竞争力的新的底牌,因此,如何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形成“眼球经济”,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而又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做大城市规模,扩大空间疆域,提高城市等级等提高城市竞争硬实力的手段仍然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出牌”,它不仅有助于城市功能的高端化,辐射范围的区域化,而且也有助于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和影响范围的扩大。

2.3 文化传统是中国都市运动的内在“基因”

“都市运动”的深层次原因则植根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表现为:

(1) 整体观念

在中国古人的意识里,帝王是“天”选定的代言人,是绝对权威的实际拥有者。而在帝王的眼里,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是他的“家”。“国家”是“大家”,是“家”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在“家国一体”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以王权

为核心的“国家体”和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体”以及“国家体”和“家庭体”所演绎的整体观主宰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与此相一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实际上是更高境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观念。

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整体性的重视使得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7]。这种根深蒂固的整体思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对集体力量和人口数量的强烈追求，这从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是把人口的多寡作为对自己政绩的衡量标准可以佐证，也印证了“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衡量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的历史事实。

把社会上无规律的个人活动整合为象征国家意识的统一行动，是中国文化中整体观的集中体现，这个过程在当代中国仍然被重复和演绎。在都市化进程中，中国人也一样把原本的个人向都市迁移的行为统一为“有限时间内发生在有限空间内”的一致行动。某种意义上，都市运动实际上是“君臣”一致、“家国一体”的当代版本。

(2) 等级思想

与西方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君权和父权的强调，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充斥着明显的等级与集权思想。化解强大自然性压力与低水平技术能力之间的冲突，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构建高度集权的单极制权力运作方式的持久动力^[4]。在等级思想和集权制度的统治下，中国人的权力意识一向被压缩在义务的角落，甚至被淡忘。等级和集权意味着秩序，在缺乏技术能力的社会，秩序则意味着高效率^[4]。毫无疑问，等级和集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人们的科学创新精神，但同时，它对绝对权威的强调建立了民众与决策者沟通的通道，使得“上令所达，无不从也”，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和决策实施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大多数国家发展得快，很大原因也是因为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思想和集权制度所决定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建立了这种信任，就相当于在普通民众与决策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国家的政策和命令能够较快地到达民众手中并得到较好地实施。近年来，为了推动都市化进程，国家制定了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对都市化运动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在1997年以后逐步展开的，与之相对应，中国1997年以后的都市化速度也显著加快。

(3) 家族思想

从原始的氏族制逐步发展演化而来的家庭制度顺应了儒家文化控制和统治人们思想的要求，并由在家庭制度基

础上推出的“孝道”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这与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忠君之道”相统一，共同作为统治民众的思想“监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直接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强化，家庭制度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起着明显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尽管都市的发展和日益“西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磨灭了都市人的家族观念和传统，然而，在都市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正在向都市迁移的农民和其他阶层，仍然带有深厚的家族观念。在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中国的城市居民还是家族的一员。家族中的一个人在都市有了工作和机会，“尝到了甜头”，通常便会鼓动和拉拢家族中的其他人一起到都市工作、生活，这种由个人、家庭再到家族的纽带关系是中国都市化的重要源泉，也是具有特征性的敲开都市大门的一块“板砖”。

(4) 内倾思想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内过于重外”、“由内及外”，具有内倾的性格，这与西方的外倾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内倾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养成了内敛、含蓄、谨言慎行的性格。这种内倾的性格以自我为中心，在国家、社会层面上，与“华夏中心论”思想殊途同归，而在个人、家庭层面，又导致了传统守旧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俗精神^[8]，而是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上推崇忠君爱国、治国平天下的壮志。

与西方一样，中国的“人文精神”也包含了自己的超越世界的图腾崇拜。然而，不同的是，西方把人格化的上帝看成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所有价值的源头，他们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间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中国的超越世界则没有走上外在化、具体化、形式化的途径，没有“上帝之城”(City of God)^[8]。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江河、闪电、大山、大海甚至身边怪诞的物事都可能被当作“天”的意志的表达，如果以具体的物事来概括中国人的信仰的话，那无疑是徒劳的。这只能说明中国人的信仰是抽象的、模糊的、内在的，但他们又一致地认为君王是天的意志的代言者，并像崇拜背后的“神灵”一样为君王尽忠。

如今，内倾的文化性格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人循顺、隐忍、懦弱和退让的性格和形象，迫使个体理性地将自己的个人意愿置于集体的目标之中，希望通过一种集体性的互助和权威执掌的平等能够给每一个弱小的生命提供苟活的生存资源^[4]。当发展、崛起成为一项关乎民族前途的社会行动，而都市化成为加快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的时候，个人行为便重叠、强化为大家一致的行为，如此强大的社会群众基础本身就是一切“运动”的温床。

2.4 管理体制是中国都市运动的持续动力

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迫使地方政府必须牟取本地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各个行政区的独立抑或分割作用，尽管都市遍地开花，中国的都市化还是难以走上美国的“大都市区化”和欧洲的“网络都市化”的道路。因为，在中国相邻的都市之间总会有那么一道看不见却强烈感受得到的“壁垒”。对地方利益的强烈追求和狭隘理解构筑了这道壁垒的坚固与韧性。在此背景下，谋求和控制更多的发展资源成为城市赢得竞争和取得更快发展的关键。现实情况下，它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手段。

其一，频繁地调整城市规划，尽可能做大城市规模，为建设用地的扩大提供政策和法规依据。在目前的体制下，支撑城市财力的重要来源是城市土地经营，扩大用地指标实际就意味着增加政府的财源。因此做大城市规模的直接动力来自于政府的发展冲动与城市经营的直接效益。

其二，频繁地调整行政区划，尽可能地提升城市行政级别待遇，扩大城市直接管辖范围。在我国，城市领导人的地位跟城市规模的大小、城市的等级直接关联。中国都市运动的背后，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中心城市行政疆域的扩容，将周边的所属县（市）撤县设区，名为行政区划的调整，实际上借此行政强势占有更多的区域资源。因为省会级中心城市的地位高于非省会级城市，计划单列城市高于一般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高于普通城市。因此，做大城市的行政效益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及其他种种效益，做大城市规模实际上就是在做大官衔并提高相应的待遇^[3]。

3 都市运动背景下的城市转型

转型（transition）可以理解为事物形态的转换，即事物从一种发展状态到另一种发展状态的转变过程。城市转型（Urban Transition）就是城市在外部环境、发展机遇或自身状态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转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发展战略以摆脱对原有非理性发展道路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获得最大的系统外部支持，规避无效率的城市增长或城市衰退，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自我扬弃、自我否定和自我创新的过程，是城市发展状态从失衡到新的动态平衡的过程。都市运动已经把城市化和都市化从单纯的地理或经济转变过程，上升为囊括一切的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换句话说，都市运动从现象上看是城市的变迁过程，而实际上

也是一种转型的过程。

都市运动中的中国城市转型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一方面，不论类型、大小、区位，任何城市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发展，都必须“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任何城市要想取得持久强劲的竞争力，都必须实现与时俱进的转型，包括城市发展的战略、产业、功能、空间、文化、管理等各方面。

3.1 城市转型的非线性变化

转型是一种质变或非线性变化。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其特点是：①转型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城市对其内外部条件变化的一种回应，是对其所处发展阶段变化的自我调适；②回应与自我调适是一个通过改变自身结构而产生新功能的过程，是由主导转型内容牵引辅助转型内容的系统演化过程，而非局部性变革；③城市转型的根本目的是对城市衰退的规避，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跃升。城市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通过转型实现发展的升级。城市在转型过程中进行着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地位与功能的匹配以及与周边城市关系等多方面的调整，呈现出稳定状态与非稳定状态交替的波动演化景象。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都市的超前发展既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非线性变化过程，也是城市实现转型发展的愿望与结果，这是推动中国都市化持续前行的“给力”手段，也是中国都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

3.2 城市转型的策略手段

城市转型既有来自于外部的诱推因素，也有来自于自身的调整需求。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背景下，城市转型源自自身发展阶段的需要，转型的目标、模式相对明确，转型的时空条件也比较宽松；当外部条件频繁变动或者难以确定时，城市转型主要源自外部因素的激发，转型的迫切性强，转型的目标、模式相对多变且不明确，需要在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再适应。从当前的外部条件看，转型发展既是都市运动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都市发展的策略手段。它表现为：

①战略转型。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影响都市未来发展的因素越来越纷繁复杂，都市发展、环境变化也越来越具有不可预测性。这种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常常使城市的战略意图与战略行动之间产生不一致即战略矛盾的出现。由于上述矛盾问题的出现以及技术路线的不断完善，同时人们对区域的认识，对区域发展

要素及其内涵的理解发生了新的变化^[9]，城市发展战略也出现了许多转型趋势：从面面俱到到问题解决型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发展型向综合目标型的转变，从规范体系型向个性化、多元化的转变，从终极目标型向循序渐进型的转变等。

②功能转型。城市向都市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城市功能的转变。功能转型就是城市通过对自身功能的不断升级转变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拓展发展腹地，提高辐射力，主导整个区域发展的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城市产业结构的更新演替，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成为许多大城市的主导产业，城市逐渐衍化出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服务中心、科教中心等功能。从城市功能转型的客观规律看，转型的方向是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的转变，从单一功能到多种功能的转变，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转变^[10]。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区域角度看，区域空间的极化和城市功能的专门化趋势出现，大都市化趋势明显，而信息化发展使城市职能发生了转变^[11]。

③空间结构转型。城市空间结构转型是一种空间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替代，实质上是空间结构进化的过程；城市空间结构转型既是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空间组织的人为干预过程^[12]。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包括内部空间结构的调整和外部空间结构的演化，从本质上讲，空间结构转型是对城市空间稀缺性的克服。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两大趋势，一是快速城市化下城市空间结构的激烈重组，二是新城建设浪潮大举推进；而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范围内统筹利用更多的土地资源，这也往往是城市向都市转型的最重要的物质空间基础的准备与强烈的标志。

④产业转型。产业低端化向高端化演进是产业转型的基本路径。1990年代以来，城市的工业用地逐步向开发区集聚成为中国城市产业空间组织的普遍现象。浙江、江苏、河北等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大量联系密切的中小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并形成区内企业之间的弹性专业化分工，结成紧密的合作网络、根植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空间组织体系^[13]。城市与都市的重要区别体现在产业方面就是产业低端化向高端化的转型。

⑤文化转型。城市的文化转型就是由忽视文化因素转向协调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通过挖掘与培育特色城市文化，营造富有城市自身性格的城市空间环境品质；通过保护和发扬历史文化，促进重视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通过重塑、提升城市形象达到延续城市文脉，丰富市民精神生活，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在国外诸多城市更

新的实践中，为了应对传统工业城市衰退，基于地域经营的文化引导型城市更新思想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潮流开始兴起^[14]，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的提升与营造已经吸引外来人口从而激发城市活力和地方经济的复兴。都市文化对地区与国家的主宰力与影响力使得培育都市文化正在成为城市政府工作的新的发展思路与战略。

⑥政府转型。城市的政府转型是指城市政府通过重塑或重构自身行为模式和组织形态，不断提高政府效率，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已经历了从全能主导型向调控主导型再到参与主导型的转型^[15]。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全能型政府向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转变^[16]。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三大因素的影响之下，当前中国城市政府出现两个主要发展趋势，一是城市政府的“企业化”倾向，二是区域政府合作机制的自发建立。前者使得城市政府更加关心城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鞭策城市政府在区域合作共赢中尽可能谋求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文军, 贺修铭. 面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都市化进程 [J]. 城市问题, 1997 (4): 32-35.
- [2] 刘士林. 都市化进程论 [J]. 学术月刊. 2006 (12): 5-12.
- [3] 朱喜钢等. 规划视角的中国都市运动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4] 武坚. 人口、环境、资源约束——决定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 [EB/OL]. 光明网—光明观察—学术观点, 2005-3-24.
- [5] Borja, Jand Castells, M.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 London: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and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7.
- [6] 杨汝万. 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城市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7]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第四版) [M]. 张理京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8]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 [9] 崔功豪, 王兴平. 当代区域规划导论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姚士谋, 汤茂林, 陈爽, 陈雯. 区域与城市发展论 [M].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闫小培, 周素红. 信息技术对城市职能的影响——兼论信息化下广州城市职能转变与城市发展政策应对 [J]. 城市规划, 2003, 27 (8): 15-18.

- [12] 朱喜钢. 城市空间集中与分散论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 [13] 王辑慈. 创新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董奇, 戴晓玲. 英国“文化引导”型城市更新政策的实践和反思 [J]. 城市规划, 2007, 31 (4): 59-64.
- [15] 王颢. 治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主导性研究 [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6.
- [16] 王甲成. 政府成长论——生态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 [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6.
- [17] 王旭. 美国城市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8] 侯百镇. 城市转型: 周期、战略与模式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 (5): 1-16.
- [19] Lardy N.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M]. Brookings Institute, 1994.
- [20] Logan J R.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2002.
- [21] John Friedmann.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